

回流行为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样性选择视角

秦诗乐¹, 鲍梦雨¹, 吕新业^{2*}

(1.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作为乡村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正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结构重塑和农村内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多样性选择视角探讨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会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主要通过促进非农就业选择与抑制保守理财观念两种多样性路径发挥作用。同时,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家庭储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但在是否参与失业保险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差异。据此提出,要提供激励或扶持政策,释放回流农村居民创造收入的潜力;强化非农就业支持,鼓励多元化资产配置,提升回流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能力;优化储蓄政策,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筑牢回流增收的防线。

关键词 回流行为; 非农就业; 理财观念; 多样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5)03-0100-13

DOI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5.03.009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其核心在于农民问题,与农村发展息息相关^[1]。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持续提升,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这一流动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单向趋势,中青年劳动力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不断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等系列社会问题。现阶段,农村居民的流动模式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型与变革,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回流现象逐渐显现,展现出复杂而多维的社会经济效应,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经济议题。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范围内农民工规模为2.74亿人,逐年以1%左右的速率上升,在2023年达到2.98亿人。但10年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规模逐年下降,2023年降至6751万人,农村居民本地转移、省内转移趋势明显^[2],转移目标已由单纯的“维系生计”转变为“追求发展”。农村家庭在老家县城购房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普遍趋势^[3],老家县城成为回流者在有限能力下实现完整家庭定居并享受城市资源的理想目的地^[4]。上述现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农村居民群体的流动模式逐步形成省际、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格局^[5],即部分流出寻求外部机会,同时还有部分外出后选择回流。

回流趋势关系着乡村振兴的实施逻辑^[6],农村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就业,对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推动资源再配置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影响深远^[7],可积极促进流出地与回流地的互补性提升,形成城乡经济互动的新格局。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回流的农村居民一般具备较高的收入潜力,但回流者的就业转换呈现低匹配率和高失业率特征^[8],回流后会存在技能错配、就业稳定性问题^[9]以及持续性问题^[10],会导致回流者陷入长期的“生存性生计”陷阱。因此,在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结构变

收稿日期: 2024-10-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水稻规模户‘双减’行为及干预策略研究——基于纵向协作视角”(722731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目标导向下农民生产决策的驱动力及转化机制研究: 基于绿色素养视角”(72403110)。

*为通讯作者。

迁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回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并进一步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源仍然是当前需要密切关注的复杂议题,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与重点方向。回流行为对于收入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外部经济机会,更与农村居民对于就业路径与理财方式等可多样性选择的内在转变密切相关。回流行为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基于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原则所作出的理性决策。从多样性选择视角来看,回流农村居民在回乡后面临的核心抉择主要包括非农就业选择与理财观念选择,这将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并塑造他们的收入水平演变机制及财富积累路径。

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力资本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农村居民因家庭、环境和经济因素选择回流,形成的新经济动态,既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趋势,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一过程促进了回流群体的非农就业选择。他们受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个人技能匹配度的综合影响,倾向于选择适应当地经济转型的非农就业机会^[11]。可见,农村居民的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会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12]。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选择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劳动者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个体经济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推动农村整体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回流群体在外务工期间,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促进了家庭层面决策模式的转变^[13],尤其是在财务管理与投资策略上。尽管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理财意识较低的现象,但回流群体通过接触城市的现代经济理念与理财工具,在社会认同与模仿效应作用下,理财观念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数字理财的发展,使得他们更多地参与金融市场,满足了多样化的金融资产配置需求^[14],增加了财产性收入^[15],并逐步成为影响收入变化的潜在机制。基于理财收益能够优化收入结构^[16],所以回流农村居民理财观念的转变,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推动农村社会的进步,形成良好的经济生态,也将反映现代农村经济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积极互动。回流的农村居民所具备的多样性选择优势与能力,展现出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17]。对于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提升农村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大有裨益,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检验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讨论非农就业选择和理财观念选择等多样性选择在其中的机制作用,提出优化资源配置的具体路径,以期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 文献综述

2012年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进入加速融合期,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被动回流”逐渐转变为“主动回流”,这一经济现象预计将长期存在。随着城市经济形势、政策变化和个人需求的调整,原有进城人口的行为模式也在不断变化^[18]。基于生活成本、就业环境、自身生活方式及家庭因素,他们可能选择离城返乡^[19],并在农村从事务工、创业或置业。基于以往文献的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定义为:农村户籍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外地就业和生活半年以上后,返回户籍所在地并重新从事就业、生产和生活的行为。回流行为的主体为原有的农业人口,回流后依旧保持农村居民身份。“回流行为”的主体为农村户籍人口,回流者在农村的务工、创业或置业行为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回流行为作为农村居民的动态特征,影响其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与收入水平,是本研究的重要考量。

作为承载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验的重要群体,回流的农村居民是畅通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新支柱。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城乡之间推拉合力作用下,回流趋势呈现出动态变化性与区域差异性特征。其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明显的“钟摆”式特征^[6],流出与回流及回流与再外出的非稳态流动频度提高^[20]。生命周期理论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划分为年轻时外出务工与年老后回乡务农或经商两个阶段,流动劳动力的“生命周期”到了特定阶段时必然会按预期返回到农村^[21]。其二,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回流水平主要表现为高度回流区空间范围较小、分布较散,中低度回流区和低度回流区空间范围较大,即回流水平等级越高,空间集聚越不明显^[22]。人

口迁移是在推与拉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共同形成的,在城乡推拉方面,户籍限制^[23]或落户门槛^[24]是最主要的屏障,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难以获得的归属感都会对农村劳动力留城定居产生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产生推力促使回流。加之农地赋权等惠农政策实施^[25]以及照顾老人及子女教育等非经济因素^[20],产生拉力吸引外出劳动力回乡。整体来说,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也受到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影响^[12]。

自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一直受农民工流动的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而且也从整体上影响着农村经济结构与区域协调发展^[20]。其一,农村居民回流具有人力资本补偿的作用,可以实现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双重回流^[26]。资本的积累程度与回流后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27],尤其是低技能型与经营型人力资本,往往更容易获得中高水平的收入。回流农村居民由于金融知识和社会文化的积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8],也会刺激当地经济活力与创新精神,增加乡村就业岗位,带来收入的创新性增长^[29],甚至会推动当地经济增长^[30]。其二,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标志着城乡协调性的发展,显示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动态^[31]。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劳动再分工,促进了高技能岗位的形成,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32]。回流农村居民的增加促使兼业和纯务农人口比例上升,这一变化抑制了农地的转出,反映了农村居民回流在保护土地资源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11]。在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加速了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区域经济整体发展^[33],为实现更均衡的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现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居民的回流原因、回流特征及回流效应,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研究。首先,立足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回流的现实特征,将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作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来讨论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具体影响。其次,基于多样性选择视角,从回流农村居民在回乡后可能面临的就业路径选择与理财方式转变出发,考察多样性选择机制是否为回流行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提供了新的路径,以期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合理的劳动力回流制度构建提供决策依据。最后,在农村居民的回流实践中,关注不同个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条件可能对回流行为的收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以期全面地理解回流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全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2. 研究假说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个体或其家庭基于成本收益比较后理性决策的结果,其背后关键因素是区域间的收支差距和经济机会^[34]。在农村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回流行为不只是劳动力的简单迁移,更是劳动力所积累与承载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动态流动和重新配置。生产要素相互传导、互动整合,最终会产生外溢效应,提升了农村市场的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甚至带来收入的创新性增长^[29],而且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调整推动当地经济增长^[30]。回流者在城市务工的技能积累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密切相关,劳动力回流与产业承接相互促进会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共同影响区域的城镇化水平^[33],回流者的技能积累与当地市场需求的双向互动,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回流行为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根据个人需求与环境变化做出的迁移选择。从多样性选择视角来看,回流的农村居民面临的核心决策主要集中在职业选择与财富管理观念上,在职业选择上,回流者在回乡后通常会在农业与非农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在财富管理观念上,回流者的理财观念也可能会从传统的保守型财富管理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投资型策略转化。多样性选择直接影响回流者的收入演变机制与财富积累路径,并在长远的时间框架内塑造其经济发展潜力。获得就业机会是人口流动的基础保障^[34],以非农就业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型是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来源^[35-36]。回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更倾向于向非农领域转移^[11],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且年龄较小的回流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37]。与农村外出劳动力不同,回流劳动力主要通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来影响农村经济,而物质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扩散效应,所以劳动力的回流将显著

促进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的流动格局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体,他们回流后会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5],他们带回的城市就业经验使其能够在乡村的非农行业中占据更高的职位。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效率提升有积极影响,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将显著提高农民收入^[38]。

劳动力迁移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的过程,农村居民的回流迁移带来人力资本回流和经济资本的回流,回流者能够发挥其在知识经验、社交能力和经济资本积累等方面的相对优势^[12]。基于烙印理论,回流者的城市经历一旦发生,对个体观念的影响会持续存在,形成烙印效应。尤其在城市务工期间,他们接触到了更为先进和多样的金融工具与理财方法,将动摇其传统农村家庭以储蓄为主的理财方式,理财观念会随着外出务工的人生经历而改变或重塑。也就是说,随着金融理财产品与技术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广泛影响^[39],外出的农村居民通过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40]以及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发展路径,接触数字金融的频率增加,促进了其金融素养的提升,这一变化将对传统以储蓄为主的资产管理方式构成冲击,从而左右回流群体的理财选择与经济回报,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1],形成城市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提升的外溢性结果^[42]。回流者将通过转变家庭财务管理方式,发挥“经历赋能”作用,优化家庭收入和财富的配置,将经历变成财富和资本。

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说:

H₁:回流行为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H₂: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能够通过促进非农就业选择来提高其收入水平。

H₃: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能够通过缓解保守理财观念来提高其收入水平。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包括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数据,选取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343个区县和1360个村(居)委会,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问卷内容详细涵盖人口特征、资产、负债、支出、收入、保障及保险等多个方面,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在数据处理中,本文剔除未满法定劳动年龄和超过退休年龄的样本,同时排除非农村户口的个体,仅保留符合研究要求的两类样本:①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并已返回农村的回流劳动力;②从未外出务工的留村劳动力。在剔除主要变量缺失和有异常值的样本后,2015年、2017年、2019年的具体样本量分别为36371、30698和30569,累计97638个观测值。各年度获得的样本量存在差异,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控制个体差异和时间效应,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便捕捉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动态影响。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根据CHFS问卷中的问题及其回答,将农村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定为上述各类收入加总并取对数。其中,工资性收入包括每个人工作实际获得的税后工资收入、税后奖金收入以及税后补贴收入;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和工商业经营性收入,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去年从事农业经营的毛收入减去成本,工商业经营性收入是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全部净利润。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结合CHFS问卷中“是否在户籍地以外其他地方有半年以上生活或者工作经历”的回答信息,根据农村居民有无曾在户籍地以外居住或工作半年及以上且已返回户籍地的这一行为具体刻画。

(3)机制变量。如前所述,在农村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多样性选择可能直接影响回流者的收入演变机制与财富积累路径。本研究以多样性选择视角为切入点,分析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机制。多样性选择涵盖了两个维度:一是非农就业选择。劳动力代表农村的人力资本,它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从而进一步影响收入水平^[43]。回流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更倾向于转向非农领域^[11],以非农就业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型是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来源^[36]。对于非农就业选择,本文通过对CHFS问卷中“职业性质”的回答进行测度,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工作(如服务业、制造业等)定义为非农就业,赋值为1;而从事农业生产则称为农业就业,赋值为0。二是理财观念选择。在外务工期间,农村居民受城市金融理财发展的广泛影响^[39],传统农村家庭以储蓄为主的理财观念或将改变或重塑,可能形成回流后理财观念转变对收入提升的外溢性结果^[42]。对于理财观念选择,本文通过CHFS问卷中家庭银行存款与家庭可支配收入额的占比来体现,以此来刻画农村居民家庭的理财态度,较高的比率表明家庭理财意识较为保守,倾向于通过储蓄的方式来增强财务安全感。

(4)控制变量。在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控制个体、家庭以及社会层面的有关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变量涵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同时考虑到年龄的非线性影响,使用了年龄的平方项。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子女数量与劳动力数量。社会特征变量则涉及经济预期和社会幸福感。变量定义与赋值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元,取对数	9.333	2.059
解释变量			
回流行为	农村居民是否在户籍地以外其他地方有半年以上生活或者工作经历:是=1;否=0	0.179	0.383
机制变量			
非农就业选择	工作性质:非农业就业=1;务农=0	0.775	0.418
理财观念选择	银行存款/家庭可支配收入	0.548	0.632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男=1;女=0	0.516	0.500
年龄	实际年龄	41.331	11.931
年龄的平方	年龄的平方	1850.593	959.696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实际年限	9.208	3.766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非常好=5	3.536	0.968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815	0.415
家庭特征			
劳动力数量	实际劳动力个数	2.644	1.148
子女数量	子女数量	1.003	0.077
社会特征			
经济预期	非常差=1;比较差=2;基本不变=3;比较好=4;非常好=5	3.081	0.702
社会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1;不幸福=2;一般=3;幸福=4;非常幸福=5	3.790	0.825

3. 模型设定

回流行为是农村居民的一种自选择行为,受个人禀赋、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自我选择特性。故而,若直接估计回流行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可能导致直接估计结果的偏误。为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控制潜在的自选择偏差,探究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具体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反事实推断,构建了一个与回流处理组在非处理因素上相似但未发生回流行为的控制组,通过匹配和再抽样,使得观测数据尽可能接近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将劳动力样本划分为回流组和非回流组,其中, $return_i=1$ 为农村居民曾外出回流,作为处理组; $return_i=0$ 为农村居民不曾外出回流,作为控制组。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协变量。协变量 x_i 的选择应尽可能包括既影响农村居民回流行为,也影响农村居民收

入的因素,因此本文选择表1中的个体、家庭、社会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

(2)估计倾向得分。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是二分类变量,本文采取最普遍使用的Logit模型来计算倾向匹配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P(Y_{1i}) = \text{Pr}(\text{return}_i = 1 | x = x_i) \quad (1)$$

式(1)中, $P(Y_{1i})$ 为倾向匹配得分,即回流的概率值,农村居民*i*的倾向得分为在给定 x_i 的情况下,农村居民*i*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 Pr 为概率函数。

(3)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若倾向得分估计得比较准确,则 x_i 在匹配后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是均匀分布的。因此需要对 x_i 每个分量的标准化偏差进行检验,标准化偏差表达式:

$$\frac{|\bar{x}_{\text{treat}} - \bar{x}_{\text{control}}|}{\sqrt{(s_{x,\text{treat}}^2 + s_{x,\text{control}}^2)/2}} \quad (2)$$

式(2)中, $\bar{x}_{\text{treat}}$ 和 $\bar{x}_{\text{control}}$ 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劳动力协变量每个分量的均值, $s_{x,\text{treat}}^2$ 和 $s_{x,\text{control}}^2$ 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劳动力协变量每个分量的方差。选择三种匹配方法将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即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

(4)计算平均处理效应。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估计的一般表达式为:

$$\widehat{ATT} = \frac{1}{N_1} \sum_{i:\text{return}_i=1} (Y_i - \widehat{Y}_{0i}) \quad (3)$$

式(3)中, N_1 为处理组农村居民的数量。如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分,计算处理组收入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以此来衡量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其表达式为:

$$ATT = E(Y_{1i} | \text{return}_i = 1) - E(Y_{0i} | \text{return}_i = 1) = E(Y_{1i} - Y_{0i} | \text{return}_i = 1) \quad (4)$$

式(4)中,ATT表示回流农村居民(处理组)收入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 Y_{1i} 表示回流后的收入情况,而 Y_{0i} 则为农村居民没有外出回流的收入情况, $Y_{1i} - Y_{0i}$ 为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的净效应,表示同一居民有外出回流与没有外出回流的两次不同的实验结果,即农村居民如果没有外出回流经历,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外出回流后的收入水平的差异。 E 为条件数学期望。

三、实证分析

1. 基准结果分析

(1)基于Logit的倾向得分估计结果。根据Logit模型,确定倾向得分估计值,以衡量样本外出回流的概率,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个人特征方面。男性的回流概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男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责任有关。年龄及其平方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且年龄的边际效应为正,而年龄平方的边际效应为负,这表明年龄与劳动力回流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次,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的劳动力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回流的概率降低0.4%,意味着在劳动力数量多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外出打拼,向外获取更多资源而非内部瓜分,这与中国文化中继承制与兴家规律相一致。最后,社会特征方面。较高的社会幸福感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这表明,当人们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时,更倾向于选择“安于现状”,从而减少外出务工或者回流的意愿。

(2)平衡性检验。为了检验匹配质量的可信度,本文通过平衡性检验来考察组别间系统差异的消除情况。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均表现出良好的匹配质量,限于篇幅,此处仅简要分析核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3)。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全部大幅下降并控制在10%以内,接受“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满足匹配后组间每个特征变量都不具有系统性差别的要求,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有效降低了回流组与非回流组的组间差异,减少了组间异质性,平衡性假设基本得到满足,倾向得分匹配对于数据的平衡效果较好。

表 2 倾向得分的 Logit 估计结果

N=97638

变量	dy/dx	标准误	z 值	$P> z $
性别	0.044***	0.005	8.57	0.000
年龄	0.010***	0.001	13.62	0.000
年龄平方	-0.000***	0.000	-12.14	0.000
受教育程度	0.004***	0.000	9.00	0.000
健康状况	0.003***	0.001	3.52	0.002
婚姻状况	0.009***	0.002	3.56	0.000
劳动力数量	-0.004***	0.001	-4.02	0.000
子女数量	0.000	0.009	0.00	0.998
经济预期	-0.001	0.001	-0.91	0.363
社会幸福感	-0.007***	0.001	-5.51	0.00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平衡性检验结果

N=97638

变量	匹配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化偏差	t 值	$p> t $
性别	匹配前	0.625	0.492	27.0	32.06	0.000
	匹配后	0.625	0.625	0.1	0.06	0.956
年龄	匹配前	38.525	41.942	-29.6	-34.52	0.000
	匹配后	38.525	38.565	-0.3	-0.34	0.732
年龄平方	匹配前	1605	1904.1	-32.5	-37.60	0.000
	匹配后	1605	1607.1	-0.2	-0.23	0.820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9.904	9.056	23.1	27.08	0.000
	匹配后	9.904	9.861	1.2	1.15	0.248
健康状况	匹配前	3.609	3.521	9.2	10.90	0.000
	匹配后	3.609	3.606	0.3	0.29	0.772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795	0.819	-5.7	-7.00	0.000
	匹配后	0.795	0.793	0.6	0.25	0.606
劳动力数量	匹配前	2.583	2.657	-6.5	-7.80	0.000
	匹配后	2.583	2.610	-2.4	-2.28	0.023
子女数量	匹配前	0.003	0.004	-0.4	-0.45	0.650
	匹配后	0.003	0.003	-0.2	-0.20	0.840
经济预期	匹配前	3.058	3.086	-4.1	-4.86	0.000
	匹配后	3.058	3.064	-1.0	-0.93	0.352
社会幸福感	匹配前	3.748	3.799	-6.1	-7.32	0.000
	匹配后	3.748	3.761	-1.6	-1.47	0.143

(3)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分析。本文采用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方法,对农村居民回流组与非回流组的特征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均显著。匹配前,ATT 值为 0.352,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匹配后,通过五种匹配方式估计出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分别为 0.165、0.159、0.151、0.173 和 0.179,且 t 值均大于 1.96 的临界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个体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假说 H₁ 得以验证。与匹配前的 ATT 值 0.352 相比,匹配后下降至平均 0.165,这说明忽视自选择偏差会导致对回流行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程度的高估。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修正样本选择偏误是必要且有效的。由实证结果可知,回流行为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形成了生产要素在回流过程中的互动整合与外溢效应,是推动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N=97638
	处理组	控制组	ATT值	标准误	t值
匹配前	9.622	9.270	0.352***	0.017	20.49
匹配后：					
近邻匹配(n=1)	9.622	9.457	0.165***	0.021	7.76
近邻匹配(n=4)	9.622	9.463	0.159***	0.019	8.30
卡尺匹配(0.01)	9.622	9.471	0.151***	0.017	8.74
卡尺匹配(0.04)	9.622	9.449	0.173***	0.017	10.06
核匹配	9.622	9.443	0.179***	0.017	10.43

注：近邻匹配采取1对1匹配和1对4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值为0.01和0.04，核匹配为默认值，默认使用二次核，默认宽大为0.06。

2. 稳健性检验

基于研究结论稳健性的考虑，本文还采用4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筛选子样本、替换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替换被解释变量	(2)替换解释变量	(3)样本筛选	(4)替换模型
回流行为	0.075***(0.008)		0.255***(0.030)	0.207***(0.025)
外出务工时长		0.001*(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7638	97638	30698	97638
R ²	0.094	0.115	0.091	0.10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加显著。特别在农村地区，消费不仅引导生产升级，也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优化，是衡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对数，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涵盖烟酒、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表5中列(1)显示，回流行为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结论一致，验证了本文所构建模型的可信度和稳定性。

(2)替换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为检验稳健性，本文将问卷中“最近一次离开原籍地外出务工的时长”作为回流行为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2)。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时长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外出务工时长对农村居民的个体收入仍具正向影响，表明前文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3)样本筛选。2015年6月，针对农民工“返乡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①。该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创业培训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缩小至2015年后具有返乡回流行为的劳动力及留村劳动力的样本，以此来检验稳健性。结果见表5列(3)，回流行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其具有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结论一致，进一步增强了前述结果的可信度。

(4)替换模型。采用分位数回归替代原PSM模型，同时在0.25、0.5、0.75分位点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均显示回流行为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由于篇幅所限，表5列(4)仅列出中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未曾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前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出的结论一致，再次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①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21/content_9960.htm.

3. 内生性讨论

虽然研究充分考虑了回流行为的自选择性以及不同层面固定效应等控制变量,尽可能地回避由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但依然无法完全保证已有结果的因果性和可信性。因为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与收入之间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尝试采用寻找工具变量的方式来构造因果识别策略,解决可能的内生性估计偏误问题,进一步验证前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借鉴Rozelle等^[44]和周广肃等^[45]的做法,选择“回流氛围”(所在区/县除本人外的其他外出回流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回流氛围”反映的是一个区域内回流群体的普遍性,能够间接衡量一个地区的回流倾向。较高比例的回流居民可以通过社会学习效应降低个体回流的认知成本,进而影响其回流决策。因此,回流氛围的滞后一期能够作为个体回流行为的外生影响因素,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滞后一期的回流氛围代表了过去的回流趋势,而非当前的经济状况,因此与个体当前的收入状况没有直接关系,并不直接决定或影响当前收入水平。此外,为了进一步排除滞后一期的回流氛围可能包含的历史经济特征影响,在回归中加入滞后一期的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回流氛围滞后一期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劳动力回流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同时,第一阶段F统计值高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基本上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说明本文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回流行为的确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表6)。

表6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N=46527

变量	劳动力回流	农村居民收入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回流行为		0.271*** (0.084)
回流氛围滞后一期	2.695*** (0.056)	
收入滞后一期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 ²	0.096	0.339

四、进一步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那么,其中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为了进一步明确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因果效应,需要深入分析潜在的作用机制。本部分将从择业与理财上的多样性选择出发,深入探讨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选择和理财观念选择在影响过程中的机制作用。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个体的经济行为与决策,揭示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深层次影响及其内在逻辑,同时,揭示不同群体在收入变化中的反应差异,以全方位检视这一影响的整体效应,从而把握个体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1. 机制作用检验

(1) 非农就业选择。从非农就业选择的角度出发,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在回归中引入回流行为与非农就业的交互项,探究非农就业选择在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中的机制作用。结果如表7所示,列(2)表明,回流行为与非农就业的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非农就业选择是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产生影响的关键机制,研究假说H₂得以验证。这一实证结果的背后逻辑表明,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提升,不仅仅是非农就业选择的简单结果,而是通过技能、知识、资本与信息的多维流动与交互作用。农村居民回流后,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再配置在农村非农产业中具有外溢作用,而非农就业的选择通过改善劳动生产率、优化就业结构、促进技能升级等多维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升级和就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强了回流农村居民的收入创造能力。

(2) 理财观念选择。为验证理财观念在回流行为中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回流行为和理财观念变量的交互项。从表7列(3)可知,理财观念交互项的系数为

表7 机制作用检验的回归结果			N=97638
变量	(1)	(2)	(3)
回流行为	0.280*** (0.017)	-0.052(0.039)	0.296*** (0.016)
非农就业选择		1.240*** (0.017)	
回流行为×非农就业		0.311*** (0.042)	
理财观念选择			0.392*** (0.010)
回流行为×理财观念			-0.000***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088	0.145	0.103

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越保守的理财观念越会弱化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换言之,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会通过缓解保守理财观念而提高其收入水平,研究假说H₃得以验证。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理财观念是影响回流效应的重要变量。保守型理财观念通常侧重于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方式,难以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而回流行为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迁移与流动,更涉及社会资本、技能、信息和知识的跨地域流动与再配置。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促使其理财观念的潜在转变,从传统的保守型理财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投资型理财方式过渡。这一转变增强了回流者对财富管理的信心与能力,为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规避风险奠定了基础,在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中发挥了重要机制作用。

2. 异质性分析

在回流过程中,不同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条件不同,这可能会对回流行为的收入效应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将通过关注这些异质性特征,充分理解回流行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这一现象的内在逻辑。

(1)基于家庭储蓄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在不同层次储蓄水平的家庭中,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对其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将体现出家庭经济结构和财富积累程度对个体经济决策和行为反应的具体影响。根据CHFS问卷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家庭成员银行存款,从而得出家庭的储蓄水平,并将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基于家庭储蓄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对于低储蓄和中储蓄家庭,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显著,而高储蓄家庭则未显示出显著变化。这一实证结果反映了家庭财富积累状态与回流行为对收入效应的互动关系。对于低储蓄和中储蓄家庭来说,收入增长的经济压力与发展空间相对较大,面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具危机感,更倾向于寻找有更高收入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就业技能、社会资本及理财经验,能够有效成为其回流后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收入的增长。相比之下,高储蓄家庭通常已经具备较为稳固的经济保障,对收入的边际需求较低,与中国传统的“追求稳定”和“居安思危”的中庸思维相契合。高储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资本积累已较为成熟,其经济活动的动力更多依赖于资本的增值与稳定的收入来源,而非回流带来的劳动收入或财富管理方式的转变。

表8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家庭储蓄水平			失业保险	
	高	中	低	参与	未参与
回流行为	0.116(0.075)	0.166*** (0.026)	0.306*** (0.021)	0.110** (0.044)	0.278***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5246	34485	57907	8559	89079
R ²	0.063	0.118	0.107	0.039	0.096

(2)基于失业保险参与的异质性分析。失业保险可以起到减少失业稳定就业的效果,让社会财富在就业参保人员与失业参保人员之间进行再分配,从而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工具,失业保险对回流群体的收入稳定性具有直接影响,这对于理解回流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决策与收入水平的变化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将样本分为参与失业保险与未参与失业保险两组,进一步探讨这两种情形下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差异。从表8可以看出,对于参与和未参与失业保险的农村居民来说,回流行为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未参保群体通常面临较高的收入波动性和经济不确定性,出于经济风险规避和机会寻求的动机,回流行为显著提高了其收入。而对于参保群体而言,回流行为对其收入的显著提升依然存在,这可能是由于参保群体通常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基于资源整合和主动选择,他们能够通过自身比较优势,将其有效转化为经济收益。

五、结论与启示

回流是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反映了农村居民对经济机会的重新评估,显著影响农村的经济环境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本研究探讨了回流行为、多样性选择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显著提升了收入水平,对于激发农村经济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多样性选择是农村居民回流行为对其收入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回流行为通过促进非农业就业选择和缓解保守理财观念两条路径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第三,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家庭储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但在是否参与失业保险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回流行为对低储蓄和中等储蓄家庭的农村居民表现出更强的增收效应,而对高储蓄家庭的收入影响则相对较弱。此外,无论是否参与失业保险,回流行为均对农村居民收入表现出显著的增收效应,参保状态并未显著改变回流行为对收入的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提供激励或扶持政策,充分释放回流农村居民创造收入的潜力。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以及市场准入便利等措施,激励回流农村居民在当地开展生产性活动,提升其收入水平,为农村经济注入新活力。第二,强化非农就业支持,拓宽灵活就业渠道;鼓励多元化资产配置,提升回流居民的收入增长能力。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职业转型与收入增长,助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第三,优化储蓄政策,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筑牢回流增收的防线。根据回流农村居民的特征,设计合理的储蓄结构优化措施,提升其财富积累能力。完善风险保障机制,扩大农村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回流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19-24,79.
- [2] 吴方卫,卢文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重力重构及其内在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24(6):2-19.
- [3] 何经纬,曹海林.家庭视角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形成逻辑及其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0-130.
- [4] 张家宸,汤爽爽,黄耿志.拼装理论视角下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决策生成机制——以江苏省扬州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24,43(7):1750-1768.
- [5] 殷江滨,李娜.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108-115.
- [6] 李芳华,姬晨阳.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弹性估计——基于空间断点回归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2(2):36-55.
- [7] 夏金梅,孔祥利.1921—2021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嬗变、导向与双向互动[J].经济问题,2021(6):9-15.
- [8] 钱宏胜,朱宇,李林月,等.回流劳动力的就业转换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七省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23,29(2):15-28.
- [9] ZHU Y, WANG W W, LIN L, et al. Return migration and in situ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sending areas: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J]. Cities, 2021(1):103242.

- [10] 易丽丽,张哲鸣,果佳.志愿机制何以实现城市人才柔性持续回流乡村?——基于“萍聚京城”公益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4(9):23-32.
- [11] 康姣姣,闫周府,吴方卫.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21(7):72-86.
- [12] 任远,施阔.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J].人口研究,2017,41(2):71-83.
- [13] GALOR O, STARK O. Migrants' savings, 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migrants'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0, 31(2):463-467.
- [14] 宁爱照,刘现武.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健康:特征优势、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9):30-40.
- [15] 邓金钱,张娜.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2(6):77-93.
- [16] 杨雅鑫,宋科,张劲帆.互联网理财、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互联网平台居民理财行为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24(1):56-75.
- [17] 郑兆峰,高鸣.农村人力资本助推新质生产力:关键问题与政策优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0-21.
- [18] 林亦平,魏艾.“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补位”探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8):91-97.
- [19] 杨云彦,石智雷.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J].人口研究,2012,36(4):3-17.
- [20] 吴方卫,康姣姣.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0(3):47-60,127.
- [21] DUSTMAN C. Return migr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J]. Economic policy, 1996(11):213-250.
- [22] 何田,郎雨,青丽波,等.乡村振兴视角下脱贫地区农村劳动力回流多维特征及形成机理——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J].人文地理,2024(3):132-141.
- [23]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207.
- [24] 张吉鹏,黄金,王军辉,等.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J].经济研究,2020,55(7):175-190.
- [25] 牛坤在,许恒周.农地赋权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基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J].中国土地科学,2022,36(3):51-61.
- [26] ZHAO 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376-394.
- [27] 张娜,雷怀英.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3(7):45-52.
- [28] JUNGE V, DIEZ J R, SCHÄTZL L.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return migration in Thailand and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1(7):94-106.
- [29]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4):1557-1580.
- [30] SUTTER C, BRUTON G D, CHEN J.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1):197-214.
- [31] 辜胜阻,孙祥栋,刘江日.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战略思考[J].人口研究,2013,37(3):3-10.
- [32] XU X, JIN Z.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employment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4, 91(2):101697.
- [33] 颜银根,王光丽.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J].财经研究,2020,46(2):82-95.
- [34] 张欢,吴方卫.产业区域转移背景下就业机会与收支剩余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2(6):107-128.
- [35] 张可云,黎思灏,席强敏.市民化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基于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的证据[J].经济学家,2023(10):53-64.
- [36] 黄季焜.加快农村经济转型,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J].农业经济问题,2022(7):4-15.
- [37] 杨忍,徐茜,张琳,等.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11):2305-2317.
- [38] 王铁,刘蕾.返乡创业质量与农民共同富裕[J].统计研究,2024(5):124-136.
- [39] 花弘毅,李曜.农村金融机构、居民贷款可得性与城乡收入差距[J].金融研究,2022(12):112-129.
- [40] 李琳,郭东,乔璐.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3-23.
- [41] 何学松,孔荣.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1-11.
- [42] 陈昱燃,张桥云,贺瑶.城乡金融发展梯度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研究[J].南方经济,2024(2):79-96.
- [43] 黄斌,徐彩群.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J].中国农村经济,2013(1):67-75,86.
- [44] ROZELLE S, TAYLOR J E, DEBRAUW A.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287-291.
- [45] 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J].经济学(季刊),2017,16(2):793-814.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Diverse Options

QIN Shile, BAO Mengyu, LYU Xinye

Abstract As a key driver for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eturn mi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pivotal factor in the reshaping social structures and fostering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e op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turn mi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ir income, mainly through two diversity paths: promot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oices and suppressing conservative financial attitudes.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on income show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based on household savings level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regarding participation i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hat incentives or support polici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unleash the income-generating potential of returning rural residents; support for non-farm employ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diversified asset alloc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enhance the income-growing capacity of returning rural residents; and savings policies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build a solid defense for income growth among returnees.

Key words return migr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inancial attitude; diverse options

(责任编辑:陈万红)